



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接受

高海波 刘兰珍

摘要:在留美的社会学者孙本文、林耀华等人的推动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研究先驱查尔斯·霍顿·库利的社会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起传入中国,其传播思想受到民国学术界的关注。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引介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注意到了他的交通研究,二是将传播与人类本质相联系,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库利在传播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仍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查尔斯·霍顿·库利;交通理论;人性论;传播学史

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不仅以“初级群体”、“镜中我”等理论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被视为传播学研究的先驱。国内学界对库利传播学说的认识 and 了解,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然而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早在建国之前我国社会学者如孙本文、林耀华等人不光已经对库利的社会学理论达到了非常熟悉的程度,并且开始涉及他的传播思想。

一、民国学者对库利交通理论的认识

1933年,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为《派克社会学论文集》所撰的导言中提及库利的交通理论对罗伯特·帕克社会学说的先导作用。他认为帕克对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挥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并解释道:“之所以说‘发挥’而不说创始,是因为真正的创始者,不是派克与麦甘齐,而是柯莱(C. Cooley)与韦伯(A. E. Weber)(柯氏的《运输论》在1894年发表,韦氏的《十九世纪都市的发达》在1899年出版)。派、麦二氏的功劳,乃在将柯、韦二氏已萌芽的思想发挥而广大之。”^①

吴文藻的同事赵承信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认为库利早期提出的交通理论是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他认为库利从研究交通运输开始,继而探讨人类社会的交往行为,并作为其社会学说的中心主题,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利最早提出,城市总是出现在一些交通线的交汇处,他称之为运输系统的“结点”(modal point)。这些货运中转枢纽有利于人口、财富、商业和服务等各种资源的集中,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交通运输的发展,而交通运输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一个地方的区位关系。库利的交通理论中所包含的区位分析法,后来由帕克和伯吉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一套从社会位置角度分析城市的人文区位学研究。因此,赵承信主张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便是“柯莱(C. H. Cooley)教授的社会交通的理论”。他写道:

^① 吴文藻:《导言》,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燕大社会学会1933年,第11~12页。

柯莱教授以交通运输作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然而柯莱教授的兴趣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虽然柯莱是从工程学转到社会心理学或心理的社会学的,但社会交通仍是他的社会学理论中心之一。而且在他的思想与兴趣转变当中,发挥了运时(即运输所需时间)与运费距离(time and cost distance)的理论,他便是这样有意或无意地立下今日人文区位学所谓区位距离的理论的基础。^①

藉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库利学术兴趣的转变过程。交通运输是他整个研究生涯的起点,但他的交通理论并不侧重于工程技术问题,而在交通运输的社会影响,即交通如何使人们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这就为库利后来关注传播问题奠定了基础。“社会交通”(即传播)是库利社会学说的中心主题之一,赵承信的这个判断也为后来的传播学者所证实。

刘光华是民国时期对交通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先后撰写了两本相关学术著作,一本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交通》,另一本是1932年南京书店出版的《交通政策》。这两本书都留下了库利交通理论的烙印。《交通》一书认为“人、物及思想的场所转移,叫做交通;而用以转移的一切设备叫做交通机关。”该书进一步分析道,由于被转移的对象的不同,交通可以分为通信和运输两种:“思想的交通,叫做通信;货物的交通,叫做运输。而用以通信的交通机关,名曰通信机关,用以运输的交通机关,名曰运输机关。”^②刘光华的这本《交通》在版权页上印有它的英文标题 Communications。可见,刘光华认为交通的含义与 communication 是大体相当的。同时,他将交通分为思想交通与货物交通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这也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物质交通与精神交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开始将它们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从全世界范围看,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联系起来从而探索人类社会本质的,则首推库利。刘光华在后来所出的《交通政策》中明确提到他对库利学说的借鉴。

《交通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交通》一书对交通所下的定义:“人、物及思想的空间转移,谓之交通;而用以转移之诸设备,谓之交通机关。”随后同样对交通和交通机关进行分类:“移动之方法,因移动之物体而异;思想之交通,谓之通信(Kommunikation);货物之交通,谓之运输(Befoerderung)。而移动之社会,谓之交通机关(Verkehrsmittel)。”虽然上述引文中关键概念后面所标注的都是德文词汇,但刘光华在正文之后的注释中还是提到了库利的交通定义:“库礼(Charles H. Cooley):交通者,一切种类之事物由一处移到他处之谓也。”^③可以看出,刘光华对交通的理解与库利是非常接近的:库利主张移动对象包括一切事物,刘光华认为被移动的事物分为人、物和思想,后者只不过表述得更加具体一些罢了。事实上,库利已经明确区分了物质传播(material communication)与精神传播(psychic communication),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限定,如空间型的物质传播为运输,时间型的物质传播为贮存,空间型精神传播包括手势、口语、书信等,时间型精神传播为记录和保存思想的手抄本与印刷物等。因此,尽管刘光华也参考了一些德国学者的论述,但库利的学说无疑给予了他的交通概念和交通类型极大启发。

遗憾的是,刘光华虽然提出了思想交通的问题,但由于他采取的是经济学角度,传播在他那里主要被理解为经济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他对思想交通的论述仅限于对通信业的相关经济问题的分析,对它的社会意义未予涉及。

美国当代学者彼得·西蒙森强调,库利发表他的《交通理论》的1894年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诞生元年。虽是一家之言,但亦不无道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个传播学至今仍然未能正视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库利、帕克等人的传播观念总是与交通运输交织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民国学者能够注意到库利的交通理论,并将它与社会传播联系起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民国学者对库利传播观的解读

库利在他的交通研究中发现,交通实际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社会传播的一部分。无论是思想还是

① 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载《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第151~205页。

② 刘光华:《交通》,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页。

③ 刘光华:《交通政策》,南京书店1932年,第5页、第4页、第6页。

货物,都能够实现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的转移,这种传播机制是社会得以构成的关键之所在,是社会各部分赖以依存的基础。缺少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目标,更不会有共同目标之下的分工协作,社会组织的进化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传播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机制,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库利社会学三部曲的共同主题。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库利从传播角度对人的本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当时正是进化论风靡全球的时期,从遗传、本能的角度分析人类行为的做法非常普遍。而库利则提出,人的个体生命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生物遗传,一个是社会传播。用云端女士在《古莱及其社会学说的介绍》中的话来说:“生命之给与有二,恰如一条川流与川旁道路,川流是遗传的给与,道路是社会的通传,一由胚体流动,一由言语、接触,与教育达到。本性的根源于这两样都有关系,故遗传与社会环境是彼此作用的。”^①川流不息常用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这在古今中外皆然。库利的妙思在于他用道路来形容传播,并与河流相比较,使人一下子就能抓住传播不同于作为自然过程的遗传的社会性质。

林耀华对库利所提出的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的区分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介绍道:

柯莱(C. H. Cooley)氏在1902年他的处女作《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一书的导言内,就详细分析生命的两条河道。这两条河道是什么?它们究竟有什么分别?人类生命两个源流,一个是遗传,好比一条长流的江河;一个是交通(communion),好比一条岸旁的道途。前者从细胞形质(Germ-plasma)遗留而来,后者从语言、社交、教育传达而至。道途的发生比河流较晚,因为生命在禽兽时期,只有一条河流,没有道途。人类在原始时代,一条模糊的小径渐从河旁分出,到了现在,这条小径已变成一条极实极大地道途,与那河流并驾齐驱。^②

河流与道途虽然同为交通运输的途径,但在性质上迥然有别。河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道路则根本上是人工产物,用它们来说明遗传与传播的不同特征可谓恰如其分。林耀华接着分析道:

个人生命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从河流得来的东西,好比身体全部,包括脑袋、细胞、四肢等,莫不从父母及远祖遗传而来。每代遗传的机官或河流,就是细胞原形质,此种包括可能性、可教性、可发展性、倾向、能力,以及一切先天的特质。这就是生物遗传的部分。另一方面是从交通而来的东西,这好比人与人的交互作用。先是彼此声音、姿势、面部表情等的刺激和反应,继而通言语,久而久之,一切社会副业,诸如艺术、音乐、宗教、科学、商业等,莫不如此了解,彼此互动。换句话说,个人在社会交互作用之势力下,学会了怎样感觉,学会了怎样动作,这是社会交通的部分。^③

库利的传播思想在《社会组织》一书中趋于成熟。其中不仅提出了他对传播所下的著名定义,也有对现代传播所做的全面分析。云端女士在《古莱及其社会学说的介绍》一文中的相关介绍如下:

交通(communication)。交通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构,凡能战胜空间与时间者,都包括在内。交通的种类,如面部的表情、态度与手势、声调、字眼、写作、印刷、铁道、电报、电话等,一切合拢起来,做成一个有机的全体,与人类思想的集体相符合。所以凡物在心灵生长者,皆有外表的存在。倘我们熟思这机构,则能多于我们内心生活多点关连。^④

库利从人与人的联系的角度来给传播下定义,反映了他对社会过程的重视。与此同时,他把铁路也看做重要的传播手段,说明他的传播理论与早期的交通研究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三、库利传播学在民国兴起的原因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部分感受到民国学者对库利社会学说所持的极大热忱。为什么会有那么

①云 端:《古莱(C. H. Cooley)及其社会学说介绍》,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5卷第4期,第38~53页。

②林耀华:《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载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该文原载《北平晨报》1934年4月18日《社会研究》。

③林耀华:《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载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④云 端:《古莱(C. H. Cooley)及其社会学说介绍》,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5卷第4期,第38~53页。

多中国人对一个遥远国度的书斋里的安静学者有如此之高的兴致呢?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如何认识人性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与国家的迫切需要。传统中国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个人仅仅只是伦理纲常的一环,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专制王朝覆灭后,旧秩序瓦解,新秩序亟待确立。库利学说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阐明人性本质,既承认人的独立性,又强调人的合作性,对于急需重建社会秩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库利对人的本质的分析是与社会传播的探索紧密相连的,所以他的传播学说也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孙本文对库利关于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的观点极为推崇,如他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写道:

社会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分子。离开社会,没有个人;离开个人,亦没有社会。柯莱教授说,个人与社会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了解个人,即了解社会;了解社会,即了解个人。个人与社会是双生子;是同时并存,不可分离的。又说,个人与社会,成一种有机的关系。仿佛一个音乐队所表演的音乐,由各种不同而相关的乐音配合而成。各种乐音的匀称合作,才成为一曲音乐的和谐。我们不能把一曲中各种乐音,与全曲的和谐,视为两事。故我们亦不能把个人与社会,视为两事……社会上每一个人与其他人发生联带交互关系。于是社会上即表现一种网状的关系型。此种网状的关系型,即社会生命所寄托。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犹之社会不能离开个人。个人与社会是不能分离的,是息息相关的。譬如赛球,每个球员为全队密切合作的分子。苟有一人不合作,不努力,或稍示疏忽,则全队蒙其影响。社会生活,亦复如是。一个人的活动,影响于社会;社会的活动,影响于个人。语云: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这个意思。^①

当孙本文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不论外人还是国人自己都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社会似乎由于缺乏合群精神而无法产生凝聚力与向心力,悲观失望的情绪四处蔓延。孙本文看到库利的个人与社会共生共存的观点中包含着友爱互助、乐群爱国的道理,所以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吹发扬。他在《社会学原理》的另一处写道:“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牵一丝动全网。个人行动,常可牵及社会全体。就表面言之,个人行动,在大社会的活动中,正如沧海一粟,何足轻重。但进一步分析之,才知个人行动与一般社会,关系非常密切。个人依赖社会,社会依赖个人。此种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依赖关系,就是社会生活的真相。因之,人应爱群,人应爱国,出于理所当然。”^②在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之后,孙本文进一步指出,“社会行为的发生,由于二人以上联合以后的互相交通。没有交通,便没有社会行为。”所以他强调,“交通为社会行为发生的枢纽”,因为社会行为无非就是“二人以上联合而互通声气时所表现的行为”^③。反之,假如人与人之间没有交往接触的可能,不能交换意见、互相了解,社会行为也就无从发生。可见孙本文对库利人性论和传播观的关注,有着从中国社会立场出发认识人的本质的内在需求。

毛起鹄的《个人的主观性和文化》同样强调了库利人性论对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他认为,库利主张人性社会群体的产物,是人与人相互交往接触的结果,包含三个重要论断:第一人性不同于兽性,第二人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学习的产物,第三人性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内。既然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人性同样也是社会的产物。人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没有社会就没有什么人性。但在中国,性善性恶、贤与不肖这些相互对立的人性观点一直以来并行不悖,构成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毛起鹄指出,“人性善恶的问题,鬼闹了几千年,至今还未解决”。他认为人类本没有什么叫做天性的东西,人类习性是在社会中养成的,主张本性善恶与天生贤愚,都只是一些极端武断的说辞。毛起鹄还特别注意到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称之为“人类最初步最简单的群体”。他说这种群体如家庭、邻里、游戏伙伴等,其成员关系是直接接触的,有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不但社会的物质文化赖以传递,就是文学、理想、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非物质文化,都是从这些最简单最初步的群体中学习得来的”^④。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对中国社会而言,当父母之命不可违这些最基本的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动摇之后,整

①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8~239页。

②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③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页。

④毛起鹄:《个人的主观特性和文化》,载《社会科学杂志》1928年第3期,第71~111页。

个社会面貌必然随之发生巨大而激烈的变动。

总之,传播是我们认识人类本质、认识社会本质的重要途径。在库利那里,传播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是由于西方世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变迁而发生的社会重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传播视角的特别意义或许在于它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人和社会,把人看成人,看做相互平等的个体,对于尚未完全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下摆脱的人们来说,这不啻是最动听的言说、最美妙的福音。

四、余 论

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早期的引进与接受情况大致如上所述。可以看到,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库利的著作虽然没有中译本,但他的学术观点却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其中就包括他的传播思想。作为一项专题性研究,笔者特别希望确立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即库利的传播理论引进中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这方面,民国时期学者张有桐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所发表的《社会之动态的观察》一文中有一段话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思想乃个人精神活动之成果,然而离开社会,决无实存之个人,故与社会完全孤立之思想亦莫由而生。从生理的而言,则由遗传,由社会的而言,则以语言为媒介,相互交通,由先人而后人,由个人而至于其他之个人。思想以是常流传播传布不已。但此处所谓言语者,非单指发声之话语而言,自颜面表情,态度手势,身段声调以至于电报、电话、印刷等,凡据时间以保存思想,经时间以传播思想之一切手段,包含在内之广义之言语也。社会者,由心理的方面以观察之,则不外由此传播作用而作成之一大思想组织而已。由此思想组织,乃由无量数之有机的相互关系而成,吾称之为社会思想体系(system of social thought)。其状恰如神经系统之遍及全身,亘社会之全体而流通贯注者也。^①

文章结尾说:“思想交通之手段完全发达之社会,方有自由之可言。”上述文字不管在观点上还是在措辞上,都与库利的传播思想毫无二致,很让人疑心它们是从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等书中译出的。因为像把社会看成思想组织,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界定传播,这些说法都带有独特的库利标记,非常容易辨认。

《学艺》杂志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1917年4月创刊于东京,1920年4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②。《周佛海日记全编》注释提到,张有桐,字百高,江西萍乡人,1898年生,早年赴日本留学,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江西中山大学秘书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③。另据记载,张有桐在武汉大学讲授过社会学概论课程,并写过一本题为《社会学》的书,其中将库利译作“枯列”,并论及“交通”问题,谓“由于心的相互作用而行之意识传达之手段谓之交通”^④。综合以上信息,张有桐确曾研究和讲授过社会学,对库利也有所了解,那么他在《社会之动态的观察》一文中关于传播的说法出自库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若果如此,张有桐恐怕算得上最早向国人介绍库利传播思想的中国学者了。

●作者简介:高海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传播学副教授,传播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3。Email:gaohaibo@znufe.edu.cn

刘兰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传播学副教授,传播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YJA860003)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张有桐:《社会之动态的考察》,载《学艺》1924年第4卷第1期,第1~7页。

②谢清果:《中国视域下的新闻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155页。

③《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④张有桐:《社会学》,武汉大学1932年,第11、17页。